

经济学术译丛

Academic Works in Economics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在日本获“日本经济新闻·经济图书文化奖”
在美国获“Shingo制造业研究卓越奖”

战略性外包的演化

——日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 [日] 西口敏宏 著

● 范建亭 译

Strategic Industrial Sourcing: The Japanese Advantage

经济学术译丛

战略性外包的演化

——日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日] 西口敏宏 著

范建亭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性外包的演化:日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日]西口敏宏著;范建亭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

(经济学术译丛)

书名原文:Strategic Industrial Sourcing: The Japanese Advantage

ISBN 978-7-81098-842-1/F·788

I. 战… II. ①西… ②范… III. 制造业-研究-日本
IV. F431. 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4187 号

☐ 责任编辑 吴晓群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ZHANLUEXING WAIBAO DE YANHUA

战 略 性 外 包 的 演 化

——日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日]西口敏宏 著

范建亭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宝山葭村书刊装订厂装订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5 印张 362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定价:45.00 元

为何日本的厂商在广泛地实行外包生产的同时，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呢？《战略性外包的演化》一书，对日本坚韧的供应商体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研究。这种供应商体系，形成了日本最具竞争力的两大产业即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的第一层次生产组织的核心部分。

作者西口敏宏教授，通过对有关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下包惯例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先驱性调查研究，阐明了现有的契约关系理论所忽视的诸多方面。丰富的事实根据证明，当代日本的下包惯例产生于社会经济、政治、技术以及企业层面上的各种战略性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本书彻底梳理了通常的说法，也对认为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惯例在于国民文化直接结果的学说提出了疑问。而且进一步推断，这些惯例的精华部分可以适用于其他产业的企业，并能够成为协调性生产的新范例。

本书汇集了将近十年的调查、数百次实地调研，以及对包括日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企业管理人员超过1 000次以上的采访成果，独创性地考察了关于使日本企业能够在主要市场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独特生产体系的历史性、制度性和经济上的发展因素。如本书对汽车和电子产业所做出的详尽分析那样，以企业间协调和互相解决问题为基础的这种革命性体系，从制度上促使核心企业及其下包企业双方朝着产品质量、成本控制、技术不断创新的方向发展。《战略性外包的演化》一书导出了这种关系背后十分清晰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关于产业社会未来发展的新经济组织模式。

这本在研究史上具有分水岭地位的著作，促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有关日本竞争力的惯性思维和常识，对致力于建立竞争性产业体系的相关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来说，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必读之书。

西口敏宏

(Nishiguchi Toshihiro)

日本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1952年出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硕士(M. Sc.)、牛津大学博士(D. Phil.)。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INSEAD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网络组织理论、组织间关系、政府采购、供应链管理。曾历任日本通商产业省、防卫厅等政府部门的委员。

中文版序

为什么很多企业没有全部自主生产而是将一部分生产进行外包呢？为什么日本的厂商能够在维持广泛的下包关系的同时，迅速生产出种类繁多的高质量产品？本书对日本的供应体系的历史性演化过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概括性总结，并通过对比考察近年来欧美企业的惯例，刻画出日本式体系的与众不同之处及其背后的根本逻辑。如后记所述，原著的英文版在日本和美国分别得到了权威性学术出版奖，在国际上受到了高度评价。

为完成这项研究，笔者花费了10年的时间独自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包括日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实施了1000次以上的访问。基于从得到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二手历史资料以及宏观统计数据进行的深入研究，本书提出

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见解。

第一,在汽车和电子机械这两个日本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中,日本的供应体系构成了生产组织的核心部分。不仅如此,其中的许多惯例如今有了较大改观,以制造业为中心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第二,现在能观察到的日本的供应体系,是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不断出现的社会经济、政治、技术和企业战略等因素相互作用后的产物;其成功与其说是特殊的国民文化造就的,还不如说是依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合理性的普遍性结构。

第三,在这样的历史状态中渐露头角并逐步演化而成的结构,绝非偶然性产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企业战略。这种战略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维持竞争力,时常找出合理的对应措施,并作为企业间共有的一种能力得到了积累。

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如今已演化为以企业间协调和互相解决问题为根本的这种革新体系,正如本书以汽车和电子产业为中心所分析的那样,有力地促使着核心企业和供应方企业朝高质量、低成本以及技术不断进步的方向发展。这项研究导出了产生这种竞争力的背后逻辑,提出了与产业社会的发展相关的新企业间战略性组织模式。

这本中文版是根据2000年出版的日文版直接翻译的,不过,最早的英文版原著出版于1994年。没想到的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达10年的长期性不景气之中,被认为支撑了以往的经济繁荣的“日本式经营”,其许多特征受到了胡乱批评并被逐步抛弃。一部分人对包括本书所探讨的日本供应体系在内的“日本式组织关系”的各种要素进行了无充分根据的严厉批评,甚至想当然地宣告了这种组织关系的“消亡”。

确实,在所谓“日本式组织关系”中存在不少已失去历史性意义和以往竞争力的东西。例如,金融和服务性行业中的陈腐旧习以及在经济增长期曾发挥过作用的所谓“护送船队方式”之类的官民一体化手法等,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已完全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进入本世纪后几乎都被淘汰了。但是,本书通过研究截止到 1990 年的长期性历史演化发现,问题解决型企业间关系和以此为基础的供应体系,不仅在这十多年的长期不景气时期里存活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演化,并成为支撑以汽车产业为中心的日本厂商进一步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下川,2004;池田、中川,2005)。

其中,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以丰田和本田为代表的一些优秀厂商积极开展了国际化经营,持续保持了销售额、利润和市场份额的扩大。这些企业的发展态势,如本书所分析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之前确立的供应体系的精髓部分,并将其积极地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做法。

此外,如本书的内容还涉及的,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就有欧美企业积极推进了供应体系的“日本化”,其中,德国汽车厂商宝马公司在近几年进一步提高了业绩,不仅在运动型高级轿车这一形象上面,还在其他如质量、信赖程度、性价比等实用性要素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客户满意度。另一方面,耐人寻味的是,这十多年里各种企业战略以流产告终,其中尤其在供应管理方面落后的许多汽车厂商,无论是在日本、美国还是欧洲的哪一个地区,均陷入了困境。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正毫无疑问地逐步跻身于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对中国读者来说,我想本书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无论在怎样的国家,像汽车和电子这样的大规模产业,

是由该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政府的政策、国民的技术能力以及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各种企业战略等因素之间的复杂作用构成的。因此,仅观察某个方面无法把握整体情况。譬如,在没有电也没有公路的穷乡僻壤建造大规模汽车工厂毫无意义,也不会有外资企业愿意到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此外,根本不会有企业想到技术人员匮乏的国家和地区去建立现代化工厂和办公场所,即使这些制约条件能得到缓和,仍然会有不少企业因回避风险的企业战略从而对走出国门迟疑不决。

然而,当一系列要素得到大幅度改善,并由于某种原因其相互作用一齐朝正面效应方向转变时,就会产生大规模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而且,有时候会偶然得到胜利女神的青睐,经济发展进入轨道后出现持续的高速增长,许多新的制度与此相伴不断产生并普及整个社会经济,包括供应体系在内的企业间关系的新治理机制就会迅速形成。

本书立足于系统性历史资料,以 20 世纪的日本制造业,尤其是以汽车和电子产业为焦点,剖析了其演化过程,并从多方面的角度探讨了目前所能观察到的供应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本书内容的展开,采用了正统的学术性手法,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见解,这些应该会引发读者心中对知识的好奇心吧。此外,对那些为赶超欧美而日夜奋战的中国的政府官员、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学者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些他们所关心的多方面的有益内容和观点。

第二,本书原来是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书中的见解、结论和建议绝非来自于印象论,而是根据得到彻底验证的确凿证据(hard evidence)。从国家和产业层面的宏观数据到特定企业和工厂的微观数据,本研究中的证据一应俱全。而且,这些客观数据的妥当性,通过本人花费大量时间进入世界各地的工厂而实地收

集到的庞大观察记录和逸闻性证据得到了强化和支持。所以,本书中的定量、定性数据互相补充,可以说构成了如磐石一样的经验性证据(empirical evidence)。其成果,比如说集中体现在对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及电子产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的第二篇中的,为本研究的见解、结论和建议提供了充分依据。

中国目前正试图在20年间完成产业革命以后200年的发展 and 现代化(大前,2006),对中国的民众来说,本书反复传达的信息在于,不要过早地根据印象论来对发展态势做出结论,而是基于确凿证据的比较立场,用客观数据来把握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考察支撑着数据背后的惯例和制度的机制上的差异时,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手法,即仅仅阐述可以从确凿证据中引出的事实、其他的推测和意见做限定性处理的这种客观性论述方法,会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不过,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前提在于,所提供的确凿数据本身具有可信性。

第三,因本书所涉及的题材和主题的复杂性,本项研究根据研究目的需要贪婪地吸收了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企业战略论、组织论和网络学等领域的理论框架,展开了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正是这个原因,本书与其他许多分析供应关系的著作不同,具有更宽广的观察角度。此外,本书在结构和记述方法上也下了功夫,比如,某一时代的供应商战略是如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后产生、发展或者走向衰退的,都表达得十分清楚。另一方面,如对供应管理方面的技术性信息也做了详细描述,所以其内容能满足实业家和专业人士的要求。基于这些特点,本书的任何一个部分中关于各个时代的供应体系和个别企业下包战略的多面性论述,应该说能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近年来,笔者经常有机会访问中国进行学术调研和演讲,所以不仅见到了许多企业家,与各省市的行政负责人接触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他们面对的许多问题与几十年前日本的行政官员的处境很相似。例如,该怎样规范发包企业对下包企业的粗暴行为或干脆听之任之,对那些不情愿贷款给中小企业的银行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等,这方面的问题经常会被问及。恐怕没有什么神奇功能可以做到在1分钟内马上回答这些问题,但如果参阅论述了日本战后下包制度的第三章中“政府的政策”一节,相信应该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另一方面,当厂商为应对急速扩大的市场需求大量增加生产的产品种类后,其管理的复杂性也随之上升时,什么样的供应战略才是合适的,应做出怎样的选择、重点应放在哪里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如果熟读论述了日本高速增长长期下包制度变迁的第四章,应该会有所参考并得到有益的启示。

此外,虽然说在不同的时代、国家和产业,竞争力的根源会有很大差异,但还是有不少让企业老总、厂长、管理人员等实业家头痛的紧要问题,例如,该选择怎样的产品进行外包生产?外包给谁?企业间的交易关系是以“讨价还价”方式还是以“问题解决”方式为准?在文化背景不同的海外如何开展业务?在工厂运营方面,如何在生产品种、治工具与模具、员工能力、库存管理、交货频度等具体层面上确保灵活性?关于这些问题,如果仔细阅读对比分析了日本、美国和欧洲的现行下包制度的第二篇,或许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答案。不管怎么说,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厂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反复摸索后所积累的睿智,在本书中随处可见。对此不加以利用和借鉴的话未免可惜。

本书虽然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但仅以本人直接接触的事

情为例,如后记所述,就有美国的大型汽车厂商和飞机制造商在20世纪90年代以本书为参考,重新构筑了自身的供应战略。如果本书同样能够为中国经济界的各方人士提供有益的参考,那就是笔者莫大的荣幸。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作用不仅在学术方面对有关日本竞争力的传统学说和契约理论提出了值得重新思考的新模型,而且对那些正在思考如何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间关系和产业体系的企业管理人员、政府官员来说,提供了从实践的智慧到战略性洞察等方面的有益启示。文章起首所提到的日美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反映了本书的这种特征。

最后,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笔者要衷心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范建亭副教授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范先生承担了全书的翻译工作,其细致入微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钦佩。在笔者供职的日本一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范先生,日语水平超群,在他的努力下,从已更正了英文版若干错误之处的日文版直接翻译出来的中文版,从某种意义上讲说不定就是本书的最佳版本。中国作为21世纪毫无疑问的经济大国正在飞跃发展,能够拥有中国的广大读者,相信本书的意义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西口敏宏

2006年9月26日

于东京都国立市一桥大学研究室

前 言^{*}

20 世纪后半期,日本发展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后,其产业结构和背后机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从产业政策到雇佣惯例以及企业内工会等各种正式的制度成为了常被研究的对象。工作后的喝酒、单位同事之间的周末交流活动之类如今已逐步被废除的非正式的社会习俗,也作为体现日本商业体系特征的“润滑油”而被加以强调。但奇怪的是,关于推动日本经济发展至目前地位的生产活动在企业之间究竟是如何被组织和运行起来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研究。尤其是在国际性学术活动的场合也大抵如此。本书作为进

^{*} 本书的前言是基于本书的英文版著作 *Strategic Industrial Sourcing: The Japanese Advantage*, 19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并根据其后发生的一些情况等重新修改完成的。

一步理解企业间契约关系及其管理的切入口,以制造业的外包活动为对象,以相关历史资料以及有关现代惯例的独创性国际比较数据为基础,试图对此问题做一番新的探索。

本书对那种认为日本的产业是由二元经济框架中的不平等下包关系所支撑的传统解释提出了疑问。基于有关过去的发展历程和近年来的惯例等方面的事实根据,从新的观点出发重新探讨以往只是认为大企业対中小下包企业单方面榨取的问题。在第一篇,追踪了日本制造业的外包活动从放任自由的竞争状态演变到协调性下包关系的过程,并进一步实证这种演变与确保各种各样的高质量、低成本产品的持续性生产具有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将阐明,在日本,社会经济、技术上的基础设施在历史的各阶段产生了各种下包形式的出现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欠缺这些条件)。此外,对用于解释特定契约形式的创造和存活的“国民性”的可能性,基于事实根据提出了强烈的疑问。第一篇还将充分讨论在促使经济的外围或边缘部门安定化上发挥作用的政冶影响力。在第二篇,对比分析了日本的现代外包体系与欧美的传统“讨价还价导向”型下包惯例之间的差异。根据定量数据阐明日本式惯例的优点,同时通过作为补充的定性分析,剖析日本式体系所具有的“解决问题导向”的基本原理使得各种经济主体的联结和协调成为可能,并阐明产生于厂商战略的一系列制度性机制对此发挥了支撑性作用。

在社会经济、技术、政治、厂商层面的战略性相互作用的长期进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制造业厂商创造出工业产品外包的具有特色的新体系,其各种构成要素在国际上也对许多竞争对手企业的战略制定产生了影响,并被逐步推广应用。本书所揭示的有关日本的战略性外包的解释,对许多国家的未来企业活动及其发展

方向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迪性,能够对构筑新经济组织的范例有所贡献。

在执笔本书的过程之中,笔者的个人经历有了较大的变化,从作为博士生就读的牛津大学 Nuffield College,转到作为研究员的麻省理工学院以及作为博士后的法国 INSEAD 商学院,进一步转到作为管理学副教授所执教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在经过了前后大约 15 年的海外生活后于 1994 年秋天回到日本,目前作为教授在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从事有关管理学方面的教研工作,同时也参加了相关政府机构的委员会等,整日潜心于研究工作。

正如每一项需要长年累月地研究和思考的工作,本研究也是在众人的帮助之下得以完成的。牛津大学的 John H. Goldthorpe 教授通篇阅读了初期阶段的文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当时记录下这些评语的笔记本,仍然是本人最有价值的知识财产的一部分。伦敦大学的 Ronald P. Dore 教授阅读了全部初稿,不仅对学术著作的写作和构成等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也为笔者学术方面的发展播下了种子。这两位教授也是笔者向牛津大学提出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时的正式指导教官。按照英国的学位论文审查的传统,指导教官不能成为自己学生的博士论文审查员,该项工作是由另外任命的牛津大学 Duncan Gallie 教授和伦敦大学已故的 Keith E. Thurley 教授担任的。本书则以该博士论文为基础。博士论文初稿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完成的,当时所属的麻省理工学院为我完成博士论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Charles F. Sabel 教授给予了富于洞察力的批评指导,Michael A. Cusumano 教授提出了十分全面的反馈意见。两位教授阅读了全部初稿,他们给予我的激励,成为了本项研究得以持续下去的强大动

力,有时候也发挥了降低过度热气的冷却水作用。Richard Locke 教授阅读了初稿的一部分,从政治学角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Daniel Roos 教授和 James P. Womack 博士特意免去了笔者当时作为研究员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汽车计划(International Motor Vehicle Program,简称 IMVP)项目组方面的事务性工作。另外,华盛顿 & 李大学的 Michael Smitka 教授阅读了初期阶段的草稿并给出了有益的评语。

日本方面,池田正孝和清响一郎两位教授对本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笔者在世界各地(欧洲、北美、日本、墨西哥)的实地调研中,相当一部分是与他们一起进行的。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讨论本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对两位教授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在研究的各个阶段,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在此对以下各位人士(按姓氏开头字母的顺序排列)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Herbert J. Addison 先生, Bruce Ahlstrand 教授, David Allen 博士, 马场靖宪教授, 已故的 Eric V. Batstone 教授, Robert E. Cole 教授, 江口英一教授, Helen Fawcett 博士, 藤本隆宏教授, Duncan Gallie 教授, Frank E. Gillett 先生, Andrew Graves 教授, 早川滋先生, 林正树教授, Susan R. Helper 教授, Gary Herrigel 教授, 星野护先生, 兵藤钊教授, 今井贤一教授, 稻上毅教授, 石田浩教授, 伊丹敬之教授, 伊藤元重教授, Daniel T. Jones 教授, 香川勉先生, 北村行伸副教授, 北山俊哉教授, 清成忠男教授, Andrew Knapp 博士, 小池和男教授, John F. Krafcik 先生, Richard Lamming 教授, Harold Lydall 教授, John Paul MacDuffie 教授, 松岛茂先生, John McMillan 教授, 港徹教授, 三井逸友教授, 森本典子先生, 中谷严教授, 中村秀一郎教授, 西正典先生, 已故的西口

薰先生,西口光子先生,延冈健太郎教授,野中郁次郎教授,大西信隆教授,大岛卓教授,太田养一先生,大山博教授,小野甲子太郎先生, Hugh T. Patrick 教授, Ann Rowbotham 女士, John Rutter 先生, 酒向真理教授, Richard J. Samuels 教授, 岛田晴雄教授, 下川浩一教授, 白石利政先生, Barry Supple 教授, Mary Sutherland 女士, 諏访康雄教授, 高须健至教授, 武石彰副教授, 田中真树子女士, 田中一弘先生, 已故的 Keith E. Thurley 教授, 富泽木实先生, 户塚秀夫教授, Gordon B. M. Walker 教授, 渡边幸男教授, Hugh Whittaker 教授, Melinda Wirkus, Stephen Wood 教授, 山边孝教授, 山田基成副教授。

本书的完成归于在长达近十年的期间内实施的涉及 14 个国家、约 400 个团体组织、800 多人以及超过 1 000 次的现场访问所得到的丰硕成果。在此对接受采访的各位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给予了本研究必不可缺的重要信息和灵感。整体而言,从中得到的大量事实根据显示,有必要用新的视角来重新探讨榨取性契约关系这种传统的分析框架。附录 A 为被采访者一览表。当然,本书的观点来自于笔者的解释,故文责全部由笔者自负。

最后,感谢母亲西口满子以及于 1998 年初仙逝的父亲西口让,他们在艰难的长期调研活动及本书的写作期间给予了笔者无限关怀和支持。他们的激励和帮助犹如音乐中的通奏低音,时而留有余地,时而明确地给予了笔者始终奋力向前的莫大勇气。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西口敏宏

1999 年盛夏

于东京都国立市